

武漢國民政府曾是一度存在過的國共聯合政府 ——讀習近平會見洪秀柱時的講話有感

毛磊*

201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高度讚揚國共兩黨在合作時為中華民族作出的重要貢獻。習近平說：“在中華民族發展的緊要關頭，兩黨為了民族大義也幾度合作，為民族和國家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¹。所謂“幾度合作”中，其中第一次合作就是在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的緊要關頭，兩黨合作打倒了北伐軍閥，形式上實現了統一。在這個過程中，武漢國民政府是國共聯合政府，在消滅北洋軍閥取得北伐勝利的征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5年春夏之交時，中國處於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在歷史轉折關頭，中共在延安召開的“七大”上，毛澤東向大會作的政治報告的題目叫作《論聯合政府》。因為擺在當時中國人民面前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成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正如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的：“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已成為中國人民和同盟國民主輿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因此，我的報告將着重的說明這個問題。”毛澤東在這個長篇政治報告中，多次論述了歷史上國共兩黨合作的光輝歷史，其中特別提到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戰爭取得了打倒北洋軍閥的巨大成就，讚揚了1927年兩黨合作的歷史成績。實際上就是指的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兩黨合作的光輝範例。1945年提出與國民黨和各民主黨派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也是在總結了武漢國民政府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可惜的是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拒絕中共的成立聯合政府的正確主張，一意孤行，發動內戰，堅持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成為泡影。因而在20世紀中國的大地

上，只有1927年的武漢國民政府才是國共合作的政府，而且是惟一的一次國共聯合政府。應很好總結這個惟一的一次聯合政府的經驗教訓，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

所謂聯合政府，就是指一個政權不是由一個政黨組成的，而是由兩個或兩個政黨以上的人員組成的政權，政府的施政綱領也是由參加政府的政黨共同來制定並加以實施。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1927年的武漢國民政府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國共聯合政府。鄧小平在1965年就指出：武漢國民政府是“同我們黨合作……的國民黨左派政府”²。主要根據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成員 均由國共兩黨組成

（一）國民黨中央領導機關和國民政府的組成

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國民黨時，就是按照蘇聯的政治體制，即是以黨制政的體制，即國民黨領導國民政府。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利機關。大會閉幕期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最高權力。而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中央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就成為國民黨的領導核心和日常工作的決策機關，在上述機關中均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具體情況如下：

1. 國民黨“一大”與“二大”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後補執行委員中，有許多共產黨員。在孫中山親自主持的國民黨“一大”上，李大釗是大會主席團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五位成員中的一位。說明孫中山對國共合作的真誠與重視。大會選舉中共黨員林伯渠、譚平山、于樹德等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張國燾等為中央後補執行委員。在國民黨“二大”上，中共黨員的作用更加突出。吳玉章為大會籌備的秘書長。許多具體會務就由吳玉章等多位中共黨員所作。在“二大”上，李大釗、于樹德、楊匏安、惲代英、吳玉章、林伯渠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夏曦、董必武、鄧穎超等當選為後補執行委員。中共黨員雖然在國民黨中央的人數不多，但卻為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國共聯合政府打下了組織的基礎。

2. 武漢臨時中央黨政聯席會議的成立，標誌着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的初步形成。1926年底，北伐軍已攻克長江中下游地區。廣州國民政府委員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分數路北。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已停止在廣州辦公。此時，急需有中央領導機關，才能適應革命中心由珠江流域轉移到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形勢。在此情況下。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召開談話會，決定成立“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開會前，執行最高職權。以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及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席、漢口特別市黨部、湖北省黨部代表各一人為限，於十二月十三日成立。”³ 按照會議規定。聯席會議由國民黨員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鄧演達、詹大悲、宋子文和中共黨員董必武、吳玉章、于樹德共 14 人組成，鮑羅廷為顧問，標誌着武漢國民政府的建立。中共黨員參與了國民政府最高權力機關，可以說是國共聯合政府的初步形成。歷史進入了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即周恩來稱之謂的“第一個武漢時期”。

3.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領導機關成員中，中共黨員的增加標誌着武漢國民政府是國共聯合政府的正式形成。

當北伐戰爭向北方發展的重要時刻，國民黨於 1927 年 3 月 10 日至 17 日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關成員，以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在選舉中，中共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領導機關的人數有較大的增

加，具體情況如下：

1927 年 3 月 11 日，大會根據十日通過的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和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進行了選舉，選出了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中央黨部各部長、中央軍委會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他們是：

中央常務委員 9 人：汪精衛、譚延闓、蔣中正、顧孟餘、孫科、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在 9 名委員中，有兩名中共黨員，即譚平山和吳玉章。中常委的權力很大，即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執委閉會期間，可以說一切權力歸中常委。它可以決定黨政軍各方面的一切重大問題。就在最重要的決策機關的九個委員中，有中共黨員 2 人，說明武漢國民政府時期，最高決策機關是由國共兩黨黨員組成的，可以說是把武漢國民政府定性為國共聯合政府的最根本標誌。

中央政治委員 15 人：除 9 名常委外，另加上宋子文、陳友仁、鄧演達、林祖涵、王法勤、宋慶齡，以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宋子文、譚平山為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中常會下設政治委員會，作為全國最高政治指導機構。該委員會決議後交國民政府執行。在 15 名委員中有吳玉章、譚平山、林祖涵等人。而在 15 名委員中，由 7 位委員為主席團，譚平山為主席團成員之一，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一切重大問題都是由中常委會和政治委員會決定的，國民政府去執行。而中共黨員在此兩決策機構中佔有一定的比例，因而說武漢國民政府是國共聯合政府是有扎實的根據。

中央黨部各部長：組織部長汪精衛(未到任前由吳玉章代)、宣傳部長顧孟餘、農民部長鄧演達、工人部長陳公博、商民部長陳其瑗(因何香凝反對，後改為王法勤)、青年部長孫科、婦女部長何香凝、海外部長彭澤民；

軍委會委員 16 人：譚延闓、朱培德、唐生智、李宗仁、程潛、蔣中正、李濟琛、汪精衛、馮玉祥、張發奎、何應欽、孫科、鄧演達、宋子文、徐謙、顧孟餘，以汪精衛、唐生智、程潛、譚延闓、鄧演達、蔣中正、徐謙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

國民政府委員 28 人：汪精衛、孫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謙、馮玉祥、程潛、譚延闓、陳友仁、李宗仁、譚平山、紐永建、朱培德、唐生智、李濟琛、

宋慶齡、顧孟餘、蔣中正、柏文蔚、王法勤、吳玉章、何應欽、孔庚、彭澤民、經亨頤、黃紹竑、楊樹莊、陳調元、以孫科、徐謙、汪精衛、譚延闓、宋子文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在 28 名國民政府委員中，有譚平山、吳玉章等中共黨員，並由譚平山任農政部長，蘇兆征任勞工部長。這是典型的國共合作政府的體現。就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中，由吳玉章代理組織部長，標誌着國共第一次合作達到了高峰。可說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期。

(二) 武漢國民政府轄區的許多省市領導班子

僅在中央一級權力機關由兩黨黨員組成，還不能說武漢國民政府是完整的國共聯合政府，因為中央政權必須有各省市的支持才能成為真正的中央政權，這個政權才有穩固的基礎。具體情況如下：

1. 湖南省。在省一級也是以黨制政，省黨部的權力很大。中共黨員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工作的人員較多，因而實際上參加了湖南的領導班子。到 1927 年春，由武漢國民黨中央與武漢國民政府任命中共黨員夏曦為湖南省政府委員。湖南省政府也成為國共聯合的省一級政府。⁴

2. 湖北省。因為湖北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對省政府組成人員也特別重視。1927 年 2 月，國民黨中央考慮各方面意見後，指定譚延闓、鄧演達、吳玉章三人於各方面協商後，確定湖北省政府委員的人選。經過反覆醞釀，1927 年 3 月 25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湖北省政府委員會 11 人，其中共產黨員 2 人，即惲代英和董必武(兼農工廳長)。至此，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成為武漢政府的有力支柱。

3. 江西省。當北伐軍攻克南昌後，蔣介石就以國民黨中央的命義組織江西臨時會議，統一管理江西全省的政治、經濟、軍事。在 12 名委員中，國民黨員 8 人，共產黨員 4 人，即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張國燾。1927 年，武漢國民政府對江西省政府進行了改組。張國燾為委員，作為中共黨員的朱克靖為秘書長，實際上主持了全省的日常工作。

4. 福建省。1926 年 11 月 6 日，當北伐軍向福建順利進軍時，蔣介石電鄧演達委任中共黨員江董琴為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決定由江董琴主持福建政務。

1927 年 1 月 3 日，由武漢國民黨中央委任的福建臨時政治會議，作為福建的最高領導機關，江董琴仍被任命為委員之一。

5. 四川省。該省的大多數軍隊歸順武漢國民政府後，1927 年春武漢國民政府發佈命令，成立四川臨時政府統一管理四川政務。委任的政府委員 12 人中，有中共黨員劉伯承、楊闇公。四川省政府成為國共合作的省政府。

6. 陝西省。馮玉祥指揮國民聯軍於 1926 年 11 月 28 日攻克西安後，1927 年 1 月任命于右任為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管理陝西各方面工作。中共黨員在這個帶有省政府性質的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如魏野疇任政治部副部長，史可軒任政治保衛部部長，楊明軒任教育廳長等。也是國共合作的省一級政府。

7. 浙江省。北伐軍於 1927 年 2 月 19 日進入杭州後，3 月 1 日浙江臨時政治會議發出通電，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命令，任命國民黨員張人傑等和中共黨員宣中華等共 11 人為浙江省臨時政治會議委員，統管全省各方面工作。

8. 江蘇省。北伐軍攻克南京後，1927 年 3 月 31 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發佈命令，任命國民黨員何應欽等和中共黨員侯紹裘、林祖涵、李富春、江董琴、顧順章共 15 人為江蘇省政府委員。

9. 安徽省。1927 年 3 月 31 日，武漢國民政府發佈命令，任命國民黨員李宗仁等與中共黨員高語罕、朱克靖共 9 人，為安徽省政府委員。

10. 上海市。在周恩來等人領導的上海工人三次起義的大好形勢下北伐軍順利進入上海。1927 年 3 月 12 日，上海市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選出紐永建等 31 人組成上海臨時市政府，其中中共黨員有汪壽華、羅亦農、顧順章。1927 年 3 月 22 日，上海市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又舉行會議，又選出一部分市政府委員。經過上海市國民黨黨部及上海政治分會審定 19 人為市府委員。其中國民黨員有白崇禧等人與中共黨員羅亦農、汪壽華、侯紹裘、顧順章 4 人。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於 1927 年 3 月 25 日覆電上海，同意 19 人名單。1927 年 3 月 31 日上海舉行臨時市政府委員就職典禮，上海市臨時政府正式成立。這也是一個典型的國共合作的市政府。

11. 武漢市。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武漢，在北伐時期有其特殊的作用。因而武漢國民政府決定武漢市為直轄市，又稱特別市。市政府組成人員中有中共黨員蘇兆征、向忠發、吳德峰等人。1949年5月武漢被人民解放軍解放後，毛澤東點名吳德峰為武漢市市長，就是因為在1927年時吳德峰曾擔任國共合作的武漢市政府的領導工作。說明武漢國民政府對後來歷史的影響。

有11個省市的政府為國共合作的政府，這在中國現代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三）在縣一級政權中也有國共合作的政府

不僅在省一級政府中有11個國共合作的省市政府，而且深入到縣一級中，也有國共合作的政府，如江西省有師古隆、王懷鑫、涂振農三人以中共縣支部書記擔任九江縣等三個縣的縣長。⁵ 儘管因陳獨秀後來不同意中共在基層政權中擔任職務而離職，但充分說明國共合作已深入到基層。另外，漢陽縣黨部和縣政府也是國共合作的縣級政權，甚至中共黨員在漢陽縣實際上主持工作，類似的情況在革命基礎較好的湖南省也出現過。而且提出的“一切權力歸農會”更是把國共合作的政權深置於農村，因為農會工作者大多數由國共兩黨黨員組成的。中共黨員以國民黨農運特派員的身份到農村工作。國共兩黨黨員並肩戰鬥在農村大革命的最前列，領導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在兩湖地區特別是湖南，農村政權已被農民掌握。領導這個基層政權的正是國共合作的政府。

綜合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從中央到省市一級，甚至到縣一級和村一級，大多是國共合作的政權。這在中國現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二、兩黨共同制定的施政綱領是聯合政府的政治基礎

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由國共兩黨黨員組成是聯合政府的組織基礎，但這個組織基礎是建立在政治基礎之上的。設有共同的政治綱領作基礎，就不可能建立組織基礎。古語言：道不同不相為謀。只有國

共兩黨的政治理念基本相同，才能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礎。國共兩黨做到了政治理念基本一致，因而才能制訂共同的施政綱領，具體情況如下。

（一）中共的最低綱領與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基本上相同

中共“二大”制訂了自己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那是遙遠未來的事，而當前一段時間實行的最低綱領，即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對內反對封建主義。而國民黨“一大”，於1924年1月召開。大會通過了《一大宣言》是由國共兩黨瞿秋白、汪精衛等人共同起草的。最後由孫中山定稿後交由大會討論通過。該宣言明確提出：對外要消除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實行三民主義。特別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民主義。這與中共“二大”制訂的最低綱領基本上一致，因而在國民黨“一大”上使第一次國共合作基本成立。為把武漢國民政府建成國共聯合政府奠定了政治基礎，國民黨“二大”於1926年初在廣州舉行，大會的精神主要是繼承孫中山的遺願，發展國民黨“一大”的成果，為北伐作了充分的政治準備。

（二）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為武漢國共聯合政府制訂了更為具體的施政綱領

進入1927年3月，革命內部發生許多不幸事件，北洋軍閥仍盤踞長江以此，與北伐軍對峙，形勢十分嚴峻，在這歷史轉折關頭，國民黨中央於1927年3月10日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由於國共兩黨委員協調一致，制訂了一系列具體的施政綱領，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 進一步加強國共合作，鞏固武漢國共聯合政府

全會通過《統一革命勢力案》決定成立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進一步加強兩黨合作的有關問題。根據此案，已把國共兩黨在國民黨內的合作發展為黨與黨之間的合作，實際上否定了在廣州時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加強和提高了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支持了主張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力量。與此相對應，會議決定加強與蘇聯的關係，提出：“必須遵

守總理決定之策略，誠意的與世界革命戰線上先進之蘇聯密切合作。”⁶

2. 把孫中山“扶助農工”政策向前推進一大步

關於支持農民運動方面，由國民黨員鄧演達和中共黨員毛澤東等共同起草的全會《對農民宣言》，提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即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這就把孫中山“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進一步具體化了。全會通過《農民問題決議案》規定：建立鄉村自治機關設立土地委員會，改造鄉村舊有武裝團體，減租 25%，沒收貪官污吏，土紳劣紳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財產等十項措施。特別應提出的是由中共黨員董必武起草的《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條例》與《湖北懲治土豪劣紳委員會條例》獲得全會的批准。這個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名義向全會提出的條例的通過，有力的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

關於工人運動，全會高度讚揚武漢與九江的工人階級以北伐軍為後盾，勇敢的收回了兩地的英租界。這是國共合作的偉大成果。全會決定進一步加強工人運動。

3. 在軍事方面有許多進步的決定

為保證繼續北伐的勝利，全會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軍事委員會，作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行政機關。為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總政治部不再屬總司令部，而改歸軍事委員會領導，對於防止軍事領袖走向獨裁和軍閥發揮了一定作用。

總之，由於國共兩黨共同制訂上述正確的綱領，從而推動北伐能勝利進行，武漢國民政府得以鞏固，國共聯合政府才得以繼續進行下去。

三、國共兩黨並肩戰鬥取得了北伐的勝利

一個行動勝過十個綱領，要想打敗北洋軍閥而統一中國，僅只有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必須真抓實幹，特別是兩黨黨員要團結戰鬥。這方面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

(一) 繼續北伐光復黃河沿岸地區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不久，北伐軍繼續向

北進攻。在這次戰爭中，國共兩黨黨員更加緊密團結在一起，成為一個戰壕裏的戰友。許多國共兩黨黨員戰鬥在一起，流血在一起。後來，曾經發生過國共兩黨爭烈士的奇跡。即在新中國成立後，對在北伐中犧牲的國民革命軍進行調查追撫的過程中，中共認為某人是中共黨員加以撫恤，給烈士家屬發烈士證。而台灣的國民黨也認為該人是國民黨員加以撫恤和紀念。兩岸當局同時紀念這位烈士，實際上也並不奇怪，因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當然就有雙重身份了。說明國共兩黨黨員在北伐中的血是流在一起的，分不清這些血是國民黨員的還是共產黨員的。類似的事情還有不少，說明國共兩黨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是何等的團結。

特別應提出的是北伐軍第七十七團的團長蔣先雲為中共黨員，他在向鄭州攻擊前進中，於河南臨潁縣附近指揮戰鬥時，中彈倒下，但他不顧一切的爬起來繼續指揮部下向北洋軍閥進攻。此時，他又中彈倒下。可是他仍英勇的站起來指揮戰鬥，打得敵人落花流水，不幸的是他又倒下，又站起來大喊殺呀！三伏三起後最終再也站不起來了，但北伐軍卻取得戰鬥的勝利。不久就光復了鄭州，人們十分感動，把蔣先雲的遺體運回武漢後，武漢國民政府隆重舉行追悼大會。國共兩黨領導人在會上發表悼詞，悲痛回憶蔣先雲在國共合作中的重要貢獻。蔣先雲出身黃埔軍校，是國民黨領導人很欣賞的愛將，也是優秀的共產黨員。說明國共兩黨不僅制訂共同綱領，而是並肩戰鬥，為實現共同綱領而流血流汗，甚至重要幹部獻出寶貴的生命。

正因為國共兩黨黨員犧牲，排除萬難，為打倒北洋軍閥統一全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國共兩黨為推動農民運動蓬勃發展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國民黨從“一大”開始就很重視農民運動。到了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對農民運動更加重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推動。

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在武昌舉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主要由鄧演達和毛澤東兩位國共黨員主持這項

工作。路綫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一切的力量，國共兩黨制定了正確的農民運動路綫之後就必須培養大批從事農民運動的幹部。國共兩黨對此均十分重視，由鄧演達和毛澤東發起在武昌建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主持日常工作，來自全國 18 個省市的農運幹部參加學習，先後培訓了近千名農運幹部，講習所成為全國“農民運動大本營”。國共兩黨領導人毛澤東等人親自向學員授課，學員回到家鄉後努力發動農民，對支持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

2. 成立中央土地委員會制訂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決議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成立了“中央土地委員會”。國民黨主席汪精衛與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以及其他兩黨主要領導人，北伐軍的許多軍長師長等超過 70 人參加會議討論土地問題。這在國共兩黨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而且在以後的 90 年間，也沒有這麼多的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員參加的最高層會議，而且會議歷時數十天，也是創記錄的。經過兩黨領導人的認真、深入、細緻的討論，最後通過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之綱領決議案》等 7 個文件。對於應沒收那些地主土地以及如何分配土地給農民、對於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財產處理問題，建立農村解決土地問題的組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都有詳盡的規定，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儘管這 7 個法律因時局的變化未能認真實行，但卻為中共“五大”和“八七會議”關於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對於解決數億農民土地問題有着深刻的影響。這是武漢國民政府為中國解決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業問題作出的歷史性貢獻。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的許多政策就是借鑒上述 7 個條例中的精神。國民黨退居台灣以後實施的“農地改革”也有許多是參照上述 7 個條例的精神，說明“中央土地委員”在國共兩黨辛勤工作下，對爾後歷史產生的深遠影響。

3. 成立全國農民協會籌備委員會以推動全國的農民運動

在湘、鄂、贛等省農民協會的倡議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與中共中央農委協商成立了“全國農民協會籌備委員會”，在籌備期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如

1927 年 5 月 20 日在武漢召開的“太平洋勞動會議”是中共中央承辦的第一次國際政治性大會。毛澤東代表全國農協在大會上致詞時提出：“中國革命是世界一部分”的著名論述。當湖北省陽新縣和麻城縣等地發生土豪惡霸殺害農會幹部慘案後，全國農協組織農民武裝予以鎮壓，對封建地主階級的反革命行為進行嚴厲打擊。這些行動大多是國共兩黨合作進行的，許多黨員在鬥爭中英勇犧牲，保證農村大革命順利進行，為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在這些地區進行土地革命做了重要的準備。

(三) 在外交上兩黨密切配合取得豐碩的成果

這方面突出的表現是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與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以及國共聯合的武漢國民政府三者密切配合收回漢口與九江的英租界。1927 年元旦，武漢人民為慶祝武漢國民政府在武漢正式辦公，舉行各種集會與活動。英帝國主義對此既恐懼又仇視，因而當漢口人民在江漢關遊行時，英國軍隊開槍打傷中國人民數十人，其中三人重傷，激起了中國人民極大的憤怒。在中共領導的工會及工人糾察隊萬人擁入英國在漢口的租界內。英國駐漢軍隊鑒於北伐軍的強大聲勢，不敢再向衝入租借內的中國人開槍。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代表舉行了多次談判，在中國軍民同仇敵愾的強大壓力下，英國人只得同意把租借交還給中國。這既是國共兩黨合作的成果，也是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用實力收回外國在中國的租借，可謂中國人民的偉大創舉。與此同時，九江人民也在北伐軍的強大力量支持下，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1927 年 4 月 3 日，日本水兵在漢口槍殺中國 9 人，傷數十人。同樣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怒吼，向日本駐漢軍事人員進行了英勇的鬥爭。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收回日租界，但顯示出國共兩黨並肩戰鬥的威力。

(四) 在兩黨關係上出現前所未有的緊密合作

在這方面的表現是很多的，如“兩黨關係委員會”成立後，多次商討兩黨合作事宜。再如舉辦農民、工人、婦女等各種訓練班，培養群眾運動的幹部，

兩黨均能密切配合。特別應指出的是中共“五大”於1927年4月底在武漢召開時，國民黨中央派譚延闓、徐謙、孫科等人組成代表團參加中共“五大”會議。國民黨主席汪精衛也到會與代表們共同討論兩黨合作。特別是討論如何對待民族工商業者的問題，中共領導人明確回答在國民革命階段，中共是保護工商業的利益不受侵害，兩黨達成共識。這在國共兩黨關係史上到目前為止，是國民黨派代表團參加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惟一的一次，值得很好珍惜這段歷史。

根據以上四方面，在國共兩黨黨員親密合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鬥爭取得了打敗北洋軍閥的偉大勝利。孫中山多次進行北伐均未能成功，而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特別是出現中國現代史上的惟一的國共聯合的武漢國民政府，才能取得北伐的勝利，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這是國共兩黨合作幹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武漢國共聯合國民政府必將永載史冊，為中國人民所稱頌。

四、武漢國共聯合的國民政府具借鑒意義

雖然歷史已過去了90年了，但我們重溫這段歷史，仍然感到有很多經驗值得當代中國人去認真吸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也就是說明武漢國共聯合政府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體現出武漢國共聯合國民政府的精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她是中國惟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奮鬥而成立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雖然不是聯合政府，但卻體現出武漢國共聯合政府的精神。如在國家六位副主席中，就有宋慶齡、李濟深兩位原國民黨的領導人。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擔任新中國中央政府水利部長，後來擔任國家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在近70年的歷屆中央權力機關中，一直都有國民黨人士擔任國家領導人。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中，均有原國民黨人

士擔任副委員長。眾所周知，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行使最高權力。在這樣的機關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總有人士擔任副委員長，如原國民黨北平市長何思源的女兒何魯麗就是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同樣，各省市也發揚武漢國民政府轄區內各省市領導班子由國共兩黨黨員組成的精神，在省一級人大常委會中擔任副主任的職務，而且遍及全國所有的省一級。如湖北省民革主委鮑隆清就常擔任湖北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有的地方在副省級或地區一級的市人大常委會中也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人士擔任副主任的職務。如武漢市屬於副省級城市，在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職位上，經常有一位民革市委主委擔任，如民革武漢市委主委單大年就擔任過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在地一級城市中大多數能實行此制度。在大陸有些省還有民革人士擔任副省長或副市長的情況，所有這些都體現出武漢國民政府的國共聯合精神。

還應指出的是為了團結國民黨人士和台灣同胞。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總有一個台灣代表團出現，很引人關注。中外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對此十分關注。台灣代表團中有許多是“台灣自治同盟”成員。他們也在人大常委會中擔任副委員長或常委職務，履行國家最高權力。

為甚麼中共一直堅持體現武漢國共聯合政府精神的統一戰綫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要聯合一切積極因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正是從這個基本理論出發，1955年，中共中央把“武力解放台灣”的政策改為“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周恩來出席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時，有外國記者問他：如果和平解放台灣得以實現，蔣介石回大陸能否擔任中央政府部長一級的職務？周恩來以堅定的口吻回答：蔣先生如能回大陸，部長一級職務太低了，應有更高的職務。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明確提出：第一次國共合作打敗了北洋軍閥，第二次國共合作打敗了日本，為甚麼不來第三次國共合作呢？正是從這個基本理論出發，中共中央一直重視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中，應有國民黨人士參加。加上其他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

表人士參加全國及各級人大的工作。中國各級政府體現出“聯合政府”的精神，絕不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攻擊的那樣，說中國政府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府。除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參加各級人大及其常設機構行使國家權力外，還有其他黨派也參加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工作，中共中央要求各黨派的代表應佔有相當的比例。除此以外，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各黨派還參加各級政協擔任副主席或常委。這都是發揚武漢國民政府的合作精神的體現。

（二）從胡連會到習馬會、習洪會體現出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國共聯席會議”的精神

國共兩黨雖然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合作的很好，但因為理念上的差別，必然產生矛盾後，特別是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一些領導人製造國共兩黨間的摩擦，就需要解決這些矛盾以堅持國共合作，因而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國共聯席會議”。國民黨出席代表為譚延闓、顧孟餘、徐謙、孫科、汪精衛等 5 人，中共出席會議的代表有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 3 人。儘管由於形勢急轉直下，此會議未能很好開展工作，不久就消逝了，但這種兩黨合作磋商的平台卻是很有借鑒作用的。因此兩黨為繼承與發揚這種精神，於 2005 年舉行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的歷史性會晤。國民黨稱之為“破冰之旅”，兩黨領導人決定成立“國共論壇”。自 2006 年開始已舉行了十一屆。在論壇上討論兩岸關係和兩黨關係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對加強兩岸和平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就是繼承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國共聯席會議”經驗的體現。

在隨後的十多年中，胡錦濤與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習近平與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洪秀柱進行了會晤，2015 年 11 月 7 日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的會晤開創了兩岸領導人近 70 年來的第一次會晤。“國共論壇”也舉行了十一屆，每次論壇都能就兩岸與兩黨關係達成許多共識，為兩岸人民做了很多實事和好事，兩岸人民也獲得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是國民黨在 2016 年大選慘敗後，竟有國民黨中的領導層人士認為大選慘敗的原因之一是國共兩黨走的太近，主張取消“國共論壇”，想重複 1927 年國民黨

“分共”而導致“國共聯席會議”消逝的錯誤。好在國民黨中央主席洪秀柱等人未採納此謬誤，2016 年 11 月習洪會在北京舉行。“國共論壇”以“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名義召開，表明國民黨有識之士願意繼承與發展武漢國民政府時的優良傳統。

（三）兩黨吸取武漢國民政府時的經驗制定“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同政治基礎

武漢國民政府時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發展的高峰，也有人稱之為“蜜月期”。為甚麼此時能把國共關係推向高潮呢？主要原因就是兩黨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就是把國民黨“一大”宣言，這個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發展為北伐的政綱，主要內容是：“打倒列強，除軍閥”，“統一中國”，“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支持工農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這些綱領為國共兩黨共同制定，成為合作的政治基礎。

時間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後，鑒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共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工作新方針。蔣經國開放老兵到大陸探親等一系列行動，特別是國民黨內主張一中原則的力量佔壓倒性優勢，迫切需要與中共溝通，恢復兩岸交流交往。在此形勢下，國共兩黨順應歷史潮流於 1992 年，達成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口頭協議，史稱“九二共識”。兩岸當局授權的民間組織海基會與海協會建立了協商機制。1993 年在新加坡舉行了“汪辜會談”。2008 年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國民黨又重新執政。在兩岸兩會的共同努力下，8 年間簽訂了逾 20 個協議，實現了“大三通”。這就是說只要國共兩黨從“一個中國”原則這個政治基礎出發，甚麼問題都可以談，沒有像武漢國民政府時期那樣兩黨的政治基礎，就不能舉行北伐並取得勝利。同樣，沒有“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要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習近平說的很好，“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四）國民黨只有發揚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的精神，才能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國民黨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兩次選舉中慘敗，許

多人認為就是因為與中共走的太近的原因，還有人認為不應叫“中國國民黨”而改為“國民黨”或叫“台灣國民黨”。有的還認為就是堅持“九二共識”，才敗在了蔡英文的“維持現狀”的兩岸政策上，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我認為根本原因是國民黨沒有高舉孫中山的旗幟。為了把第三次國共合作繼續下去並取得很好的結果，特別是要在2018年和2020年兩次選舉中獲勝，重新奪回執政權，我向國民黨建議實行“四不一沒有”。2000年，陳水扁就職演說中提出“四不一沒有”的兩岸政策。蔡英文2016年雙十節講話中也提出“四不”的兩岸政策等，有學者說蔡英文有“四不”就是沒有同意“九二共識”。所以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也叫“四不一沒有”，我來個人鄉隨習，向國民黨提出“四不一沒有”的政策就可以東山再起。

“一不”就是不忘初心，高舉孫中山的旗幟。洪秀柱認為國民黨最需要的是找回孫中山創黨時期的靈魂，這個說法很好。孫中山的旗幟內容很豐富，我認為當前對國民黨最需要的是三條：第一，振興中華。習近平在2016年11月11日紀念孫中山150誕辰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是孫中山第一次響亮的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⁷ 這個評價是很高的，也是很中肯的。即孫中山於1894年創立興中會時，把“振興中華”列為興中會的宗旨並為此而奮鬥。經過近20年的流血犧牲，於1911年武漢首義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在21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14億中華兒女的根本利益。在中國，哪個政黨高舉這面大旗，哪個政黨就會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從根本上說，2,300萬台灣人民長遠的利益就是與大陸人民一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條陽光大道，除此以外，任何道路都是災難與痛苦。國民黨一定要把眼光放遠一點，想得深一點，不要只為眼前的選票着想，要知道，在台灣，同樣是哪個政黨高舉中華復興的大旗，最終會獲得台灣大多數人民支持。洪秀柱與習近平會晤時雙方表示要共同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奮鬥，這才是根本之道。第二：堅持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民主義。所謂“聯俄”就是

孫中山臨終遺囑所說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就是要與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而對我不平等的民族就不應與之合作。美國把中國神聖領土太平島說成是礁，是對我不平等，國共兩黨應共同抵制美國此種言行。所謂“聯共”就是要與中共合作才有希望，正如毛澤東總結的那樣：“孫中山在絕望中遇到了中國共產黨”、遇到了蘇俄的幫助，才能浴火重生。的確如此，不僅各派軍閥背離孫中山，就連他親手培養的陳炯明炮轟大元帥府幾乎要了他的性命。但與中共合作後，國民黨注入新鮮血液，才能在廣東站住腳，才有後來北伐的勝利，才有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國民黨應吸取這個經驗，很好與中共合作。民進黨攻擊國民黨已成為中共的附隨機構，是賣台，不管民進黨如何誹謗，國民黨只有加強與中共合作才有出路。第三：毛澤東對孫中山的評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此八字蓋棺論定一個人，在古代有諸葛亮，在現代的政治人物中卻很少見到，說明孫中山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中國的統一而奮鬥一生。只要現在的國民黨能像孫中山那樣為台灣人民和大陸人民謀福利，就一定可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二不”就是不忘歷史，永葆青春。國民黨已有123年的歷史了，是中國大地上現存政黨中黨齡最長的一個政黨。在跨三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為中國人民作出五大貢獻，即(1)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開創了共和新時代；(2)第一次國共合作打敗了北洋軍閥；(3)第二次國共合作打敗了日本並收復了台灣；(4)把台灣建成亞洲四小龍之首；(5)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和外國分裂勢力的各種圖謀。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不珍惜自己歷史的黨是沒有希望的。前兩次國共合作取得那麼大的成就，現在實行的第三次國共合作要達到的目標就要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國民黨應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抓住機遇，再為中華民族作出第六個大貢獻，就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三不”就是不再內鬥，團結救黨。洪秀柱在2016年底新黨員入黨宣誓大會上坦言：國民黨快要完蛋了，但仍有幾千位新黨員加入國民黨，表明黨還是有希望的，從國民黨主席口中說：“國民黨快要完蛋

了！”實在不容易，的確如此，國民黨之所以面臨生死存亡之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黨內不團結，這也是國民黨的痼疾。國民黨在歷史上也有五次分裂而導致失敗：(1)1927年下半年，國民黨竟出現三個黨中央，北洋軍閥趁國民黨分裂之際，進行反攻，不僅又奪回被北伐軍攻陷的徐州，而且直下南京附近，蔣介石被迫下野；(2)1930年蔣閻馮進行中原大戰，日本乘隙而入，發動“918事變”，蔣介石第二次失去很多權力，實際上是一種下野；(3)1946年發動內戰於1949年慘敗，雖然根本原因是非正義戰爭外，具體原因之一就是國民黨內部不團結；1949年蔣介石第三次下野時，他說：我不是被中共打敗的，是被國民黨內派系打敗的；(4)2000年台灣大選，宋楚瑜脫離國民黨以獨立參選人參選，結果瓜分了連戰的票源，使陳水扁漁翁得利，國民黨敗選，失去執政權；(5)2016年大選，因為“馬王政爭”，使蔡英文當選並且全面執政，國民黨又一次遭到慘敗。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孫中山時期國民黨是團結的，因而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孫中山1925年3月12日逝世後，國民黨立即分裂。當前國民黨只有繼承發揚孫中山時代黨內團結，才能東山再起，重新執政。

“四不”就是不怕失敗，愈挫愈奮。孫中山領導武裝起義失敗了九次，第十次武昌辛亥起義才成功。辛亥革命後進行“二次革命”，護法戰爭，護國戰爭也屢遭失敗。但他愈挫愈勇，從來不在失敗面前低頭。國民黨必須發揚孫中山這種大無畏精神，振作起來，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真正接受失敗的考驗，才能東山再起。

“一沒有”就是沒有豐厚的黨產不要緊，只要有一條正確的路綫與政策就可以東山再起。國民黨原有黨產曾高達近千億新台幣，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黨。但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清算國民黨黨產，可以說是掃地出門，連黨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成為世界上最窮的政黨。不要緊，孫中山在武昌起義成功後，從美國返國，沿途經過歐美許多國家，想為新政權籌款，但西方列強卻不支持孫中山共和政府，因而當他從國外回到上海時，許多記者問他募集了多少款項，他說身無分文，但只要有革命精神就會成功。國民黨面臨斷炊的危機，不要緊，只要發揚孫中山的奮鬥精

神，特別是要有一條正確的政策與路綫。黨的政策是黨的生命，有了正確的路綫就會有頑強的生命力！

當前與今後，國民黨的正確路綫是甚麼呢？我認為就是洪秀柱所提出的不僅堅持“九二共識”，還要進一步深化“九二共識”，就是探討與大陸簽訂和平協議的可能性，把探討過程變成在台灣很好的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的過程，這是台灣人民的最佳選擇，任何別的道路都是萬丈深淵。本來，“一國兩制”是鄧小平針對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但因台獨勢力反對，加上外國的干預，陳立夫說的好：“世界上大國是不主張中國統一的。”特別是美日兩國介入的很深，因而未能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正確主張。“一國兩制”的主張反而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中卻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進而在中葡關於澳門回歸的談判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與澳門行使主權後，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20年來香港繼續繁榮穩定，中國政府希望“香港明天更美好”的願望得以實現。澳門自1999年回到祖國懷抱的近20年來，按照“一國兩制”的政策，同樣的繁榮。“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證明是科學的，是成功的。但台獨勢力卻對“一國兩制”加以污名化，造謠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是要把台灣人民弄到新疆或西藏去勞動改造，說“一國兩制”就是大陸吃掉台灣，貶低台灣。甚至說大陸不民主，大陸太窮。各種污蔑之詞不絕於耳，以此欺騙台灣人民，使台灣人民並不真正瞭解“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國民黨就應高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旗，一定要與蔡英文所說“維持現狀”嚴格分開來，決不能魚目混珠。國民黨還應特別宣傳港澳實行“一國兩制”後的偉大成就，儘管這樣做可能一時失去一些選票，但從長遠看，正義必然會勝利的。2012年蔡英文之所以敗在馬英九手下，主要原因是輸在最後一里路，就是馬英九旗幟鮮明的堅持“九二共識”，而蔡英文當時的選舉口號是“台灣共識”。兩者區別很明顯，是蔡英文敗選原因之一。而2016年大選中，蔡英文接受2012年的教訓，就是空洞的“維持現狀”欺騙台灣選民而當選。而當時國民黨候選人都不敢旗幟鮮明的堅持“九

二共識”，失去了競選的焦點，就只有失敗了。

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實行的是選舉政治，沒有選票就無法執政，再好的路綫也無法實現。這的確是很現實的問題。但如果把選票高於一切，如馬英九在執政8年間和長期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提出要把國民黨變成選舉機器，而失掉孫中山的旗幟，黨沒有靈魂了，結果帶來了2014年和2016年的兩次選舉失敗。這是強調選票優先反而敗選的深刻教訓。但是，沒有選票的確一切皆空，這兩者如何拿捏好的確是一個領導藝術問題。國民黨特別要提高這方面的領導藝術，既要高舉“九二共識”、“一國兩制”、“極終統一”的大旗，又要從主流民意的實際情況出發，把兩者巧妙的結合起來。同時，還要看到台灣的民意如流水，根本問題是要很好引導民意的走向。台

獨勢力之所以能迷惑群眾，就在於他們的欺騙宣傳，一旦揭穿他們的詐騙技倆，台灣人民覺悟了，台獨勢力就倒下了！台獨勢力能欺騙人民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決不可能長期欺騙台灣人民。國民黨要千方百計做這項艱巨的工作。對此，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之所以在此向國民黨提出詳細的建議，主要是因為在台灣，國民黨理應堅持一中原則，成為實現“一國兩制”的主要力量。只要這股力量能壯大，能勝利，“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有可靠的力量去實現。鄧小平說過：“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當時國民黨執政），又說：“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我進而提出除以上兩個希望外，再提出：“寄希望於國民黨”作補充。我衷心希望1927年武漢國共聯合的國民政府精神在中華大地上再放更大的光芒！

註釋：

- ¹ 《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載於《人民日報》，2016年11月2日，第01版。
- ² 見《鄧小平文選》(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1頁。
- ³ 徐謙：《關於武漢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經過報告》，1927年3月10日。
- ⁴ 見《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4月13日。
- ⁵ 《中央局給江西地方信——江西政府組織問題與國民黨工作等》(1926年12月2日)，載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467-470頁。
- ⁶ 劉繼增、毛磊、袁繼成：《武漢國民政府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2頁。
- ⁷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150週年大會在京舉行——習近平發展重要講話》，載於《人民日報》，2016年11月12日，第01版。